

## ※「海外劉宋研究選讀」專輯※

# 「海外劉宋研究選讀」專輯導言： 劉宋書寫 / 書寫劉宋

劉苑如\*

歷來不乏針對劉宋時期(420-479)歷史、政治、文學、藝術、宗教、思想與文化……等議題的研究，但較少如「劉宋：多視角的斷代研究」計畫，把「劉宋」當成一個問題意識。重點不在於一個特定時間標誌，也並非完全受制於朝代興革的思維，而是正視此一特定政治實體銘刻下的整體活動，包括其所從來、邊界移動，以及後世的回顧與詮釋。儘管在計畫期間(2018-2021)，邀請了各種不同領域的專家與我們文學本行互動，但最後還是要回歸到文學本質性的問題，就是反省凡此現象究竟如何被書寫、詮釋和傳播等。是以名之為「劉宋書寫 / 書寫劉宋」。

本次專輯收錄了三篇海外劉宋研究的專題論文，首為哈佛大學田曉菲教授的〈「遠想」：晉宋之際的回顧詩學及其前後〉，最初發表於本所舉辦的「劉宋關鍵詞」國際學術研討會(2020年12月15日)。該文從公元五世紀前期作家的「復古」現象做了不同以往的分析、探源和評價。有別於大部分的前行研究，或分析某一位詩人的擬古詩作，特別是陸機和陶淵明等名家的擬古詩進行解讀<sup>1</sup>；或探討對於某一時期詩人對陸機、陶淵明等特定詩人的模擬現象<sup>2</sup>；或以遊戲觀念來看南朝擬作

---

\* 劉苑如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。

<sup>1</sup> 重要著作如何寄澎、許銘全：〈模擬與經典之形成、詮釋——以陸機〈擬古詩〉為對象的探討〉，《成大中文學報》第11期(2003年11月)，頁1-36；齊益壽：〈風華清靡與慷慨悲憫——陶淵明〈擬古〉詩九首之解讀〉，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、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編：《鄭因百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(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，2005年)，頁87-104。

<sup>2</sup> 優秀作品如沈凡玉〈從擬篇法論陸機對南朝詩人的影響〉，論述南朝詩人們如何藉著擬篇，表達對陸機的呼應、認同與對話，進而將陸機形塑為一種士人困境的原型，見《臺大中學報》第45期(2014年6月)，頁123-180。

現象；或是從辨體與詩史的角度探究擬古的意義<sup>3</sup>。田文反對以名家、名作現象作為全稱式的文學史，同時也不認為劉宋詩壇是一個孤立現象。因此寧可務實地回溯從晉宋到齊梁的諸般擬古現象，不僅探討二謝、顏延之等對西晉詩人陸機樂府的模擬重寫，同時關注劉宋作家袁淑(408-453)、王素(418-471)、劉鑠(431-453)、江淹(444-505)等人都曾擬作，或者寫作定義寬泛的擬古、效古類作品，或採用亦步亦趨的寫作風格；並注意到沈約、鮑照不同時期的樂府創作，不僅體現了作者個人風格的變化，也標誌了劉宋——蕭齊文學走向的改變。凡此一類現象，田教授將其稱之為劉宋詩壇上的「回顧詩學」。

經過細膩的文本解讀，田教授指出，相對於當時在主題、情感、意象或句式上的寬泛擬作，二謝、顏延之對於陸機樂府詩作的擬作，包括逐句逐聯的重述型改寫、比較靈活的變化型改寫，以及從題目到結構進行套用的臨摹影寫；但另一方面，卻運用個人的審美觀念，對原詩作某種雅化的「改進」。故在語言上，展現了劉宋一貫追求雅奧的詩風；在內容上，則表達了對北來南人陸機博納四海的意識形態的欣賞。

最後作者總結，東晉末年軍事上的遠征和勝利，直接影響到了文化的發展，劉裕北伐得到四千萬卷圖書和樂工南渡，對於南方詩歌與音樂造成衝擊，促進劉宋獨特的回顧詩學。因此，劉宋回顧詩學並不是簡單的復古，更是劉宋文學對於過往歷史時空的「遠想」，承續一貫推進和變化的能量，方能一掃東晉席捲江南的玄言詩風。

其次，本專輯收錄了日本筑波大學副教授稀代麻也子的〈從《宋書》表現手法論〈夷蠻傳〉引用〈均善論〉的意義〉。該文乃是本所舉辦「移動：交會於五世紀」國際研討會的成果之一，經過與臺灣學者交流論辯之後，此次發表曾大幅改寫，在鋪陳現象之外，又衍生出許多原來沒有的說明性文字。該文主要論述「別為一家之學」的敘述，正好驗證了作為外來宗教的中國佛教，在當時已經發展成熟，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，甚至足以用來表明政治立場的程度。然而在論述策略上，展現了日本學者迂迴細膩的學風。閱讀此文之妙，必須回歸至作者討論沈約《宋書》

<sup>3</sup> 如葛曉音〈江淹「雜擬詩」的辨體觀念和詩史意義——兼論兩晉南朝五言詩中的「擬古」和「古意」〉，則是將五言詩細分為擬古和古意詩兩種，藉由江淹擬詩辨體的過程，解析其辨體觀念的構成，以及在詩史中的意義，見《晉陽學刊》，2010年第4期，頁87-95。

筆法的系列文章<sup>4</sup>，並將其定位於文學領域的史傳書寫研究，方可發現其擴展了過去《宋書》研究偏重於八志、語詞研究的取向，更深化了一般史學價值的泛論。

作者最核心的主張認為，《宋書》常以「立傳」、「傳論」的形式表現自身的史觀，也會透過篇幅長短、文章引用等方式，傳達撰者的史觀與評價。由於立傳與傳論較易理解，而引用則多為不言之喻，故本文同時列舉了《宋書》中各種不同的引用之例。她指出，陶淵明、鮑照、謝靈運等傳記引用作者文章的篇幅，至少七成，多則九成，反使得「傳」的部分淪為配角，卻也藉此凸顯傳主作為文學家的姿態。又如〈謝靈運傳〉引用長篇〈山居賦〉，甚至連謝氏的自注也完整保留，主要看重傳主治學嚴謹，以文字聲韻表達渾然一體的山水世界，因此採用破格的引用方式，揭示其對於謝靈運語言研究的佩服之意。另一個反面的例子，則是〈袁粲傳〉引用〈妙德先生傳〉之後，又拼貼了一則狂泉的故事，轉移了袁粲以妙德先生自詡的本意，使妙德先生更趨近於原本的創作原型，也就是《高士傳》的作者嵇康。凡此皆為沈約《宋書》試圖打破以往描述框架的特殊手法。而本文論證《宋書·夷蠻傳》編纂方式亦然，先行指出打破框架的敘述現象，然後再分析背後的原因。

〈夷蠻傳〉分為南夷、西南夷、東夷以及蠻四個部分，儘管此傳中「西南夷」的部分出現了許多佛教史材料，但在該傳之傳論並未提及佛教，可見並未如具有文學史意義的〈謝靈運傳·傳論〉般，擬藉此傳論撰寫佛教史。而〈夷蠻傳〉中長篇引用〈均善論〉，同時又保留了黑白雙方的主張，並不限於佛教一方的立場。是否再次透露了沈約不受史書框架的約束，擬藉由此種引用方式展現自己的評價？作者認為要解析此一問題，必須回歸到〈均善論〉傳播的現場，慧琳主張儒佛同歸的〈均善論〉行世之後，即遭受到教團的放逐處分。然這不僅涉及教義的分歧，也關乎建康佛教圈內的政治對立；但作者更感興趣的是，這篇引發一連串儒、佛間辯論

<sup>4</sup> 包括〈沈約《宋書》の「文史」と仁——王微伝と袁淑伝の比較を通して〉，《青山學院大學文學部紀要》第41號（1999年），頁1-19；〈沈約《宋書》における蔡興宗増の構築——袁粲像との比較を通して〉，《中國文化》第58號（2000年6月），頁30-41；〈《宋書》隱逸傳の陶淵明〉，《中國文化》第59號（2001年6月），頁1-11；〈沈約《宋書》の「帶叙法」と鮑照傳〉，大久保隆郎教授退官紀念論集刊行會編：《大久保隆郎教授退官紀念論集 漢意とは何か》（2001年12月），頁365-385；〈《宋書》における謝靈運「臨終詩」の解釋について〉，《中國文化》第60號（2002年6月），頁13-24；〈《宋書》謝靈運傳について——沈約《宋書》における表現者稱揚の方法〉，林田慎之助博士古稀紀念論集編集委員會編：《林田慎之助博士古稀紀念論集 中國讀書人の政治と文學》（東京：創文社，2002年），頁166-184。

的論文，卻受到何承天高度的讚揚，曾寫信給佛教居士宗炳，推薦此一論文。何承天表示「佛經者，善九流之別家，……與中國不異」，這一說法正與《宋書·夷蠻傳》「佛道……別為一家之學」相仿。換言之，稀代教授認為引述這篇論文，不僅意在如實地反映了當時佛教界的傾軋，另一方面暗示著沈約對於何承天的敬意。此一敬意不僅來自何承天不囿於門派，就事論事的態度，另外也表達於〈何承天傳〉中「改訂元嘉曆」事業的記載，從〈律曆志〉、〈天文志〉和〈禮志〉一再引用何承天的論述，也歷歷可見。

稀代教授最後指出：「《宋書》中立傳的人物，大多是與沈約有關的人，或與其相關人士有直接往來關係的人。……但也正因《宋書》充滿顧忌與偏頗的記載，反而提供了一把用來瞭解當時人類活動樣態的鑰匙。」

第三篇為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副教授戶川貴行的〈僑民在地化與文化變遷——以《世說新語》為線索〉，原刊載於《東洋學報》第九十六卷第三號，今由南京大學副教授于磊翻譯。選譯此文的理由，一則為《世說新語》無疑具有劉宋著述中不可或缺的代表性；二則在諸多《世說新語》研究中，多半藉此探究東晉以前的人物風範、歷史現象，較少作為理解劉宋以後的史料；三則看中該文對於日本學界相關研究引述完善，本次亦將這些研究的中文翻譯書目資料補充進去，便於華文使用者參引閱讀。

該文發端於質疑川勝義雄的說法：《世說新語》究竟是否為一部記錄貴族黃金時代的衰退，同時帶有反劉宋政權性質之作？作者指出，《世說新語》並非單一現象，同類的著作還有劉宋明帝的《江左文章志》、梁沈約的《俗說》、殷芸的《小說》、元帝的《金樓子》等，皆非文化貴族自身的作品，而常是由當時的皇族集團所編纂。因此認為，應該將這類作品放在更長的歷史脈絡下來觀察，也就是僑民在地化的歷程，以及收復中原信念的轉變。

本文首先指出，歷來《世說新語》中對於清談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態度，一是用淪喪中原來批判清談；一是認為中原傾覆與清談無涉。而這兩種不同的態度延伸至整個江南政權的文化建設，包括國家儀禮、伎樂、宴會等文化活動。如太興二年議立祭天地南郊儀、太元十二年明堂建設的朝議、咸康七年禁雜伎等，甚至最有名的蘭亭會，也無絲竹管弦。轉化的關鍵，正與收復中原目標的轉變密切相關，而《世說新語》成書的劉宋文帝時期，正處於兩種立場轉型的過渡時期。一直到劉宋孝武帝開始，重建了本當在收復中原後於洛陽興建的明堂；劉宋末期「人尚謠俗」、

「家競新哇」，齊高帝時則太樂伶官倍增，後堂雜伎，不計其數；梁世以後，清談再次流行起來，甚至連武帝、簡文帝、元帝都參與其間。

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，就是天下中心的轉移，在東晉以前，「神州」一語都指稱中原，而《世說新語》纂成的劉宋文帝時期，則存在著兩種並存的過渡現象，在文帝的詔書中，明言洛陽、建康皆為天下中心；到梁武帝北伐時，以洛陽為中心的觀念卻已不復存在，純然視之為「索虜之地」。

從以上三篇海外的劉宋研究，無論是劉宋書寫，或書寫劉宋，「流動」都是共同的特色。換言之，誠如戶川教授所言，東晉僑民在歷經百餘年在地化的過程，光復中原的想望，在晉宋之際功敗垂成，於是劉宋一朝無可避免地承擔了兩種相反理念「過渡」的歷史命運；亦如田曉菲教授的分析，這個時代兼具回顧與擴張兩種精神特質，不僅表現在劉宋的回顧詩學，更體現於諸般「遠想」的生活實踐。從另一方面來說，江南政權短暫的國祚，以至於面臨當代人書寫當代史的困境，難免有所顧忌，而稀代教授則引導我們迂迴前進，在沈約破格、隱晦的書寫中探索劉宋的真實面貌。

